

赤新

2005年1月號

【編話】

《赤新》發刊詞..... 2

【理論】

阮峰：對香港新自由主義的反思..... 3

【時評】

紅仁：9·12後看資本主義選舉制和議會制的缺陷..... 5

【社運】

民間聲明：私有化遺禍甚深 推動民主化才是出路..... 7

【投稿】

BUYO：梁國雄是一位“左傾機會主義者”和“假托派”... 9

《赤新》發刊詞

從 2002 年 9 月，我們製作了一份以宣傳社會主義為宗旨的獨立刊物——《赤色新人類》，在 2003 年中，由於經費、資源困乏，只有被迫停刊。2005 年的現在，我們正式復刊，並以《赤新》為正式名稱。

我們是誰？

我們無黨無派，我們堅持獨立自主，不接受任何外來資助。我們是一群有志於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左翼、關心工人、基層大眾的青年，我們希望能改變香港大眾對社會主義、左翼的錯誤觀念、澄清左翼的真正面貌，並為香港的勞工基層開拓自己的出路。

推動青年左翼，傳播社會主義

由亞洲金融風暴開始，香港的社會、經濟不斷浮現各種問題，當中尤其以貧富懸殊、勞工失業問題最為明顯。這也一直是我們關注的重點。2003 至 04 年兩次七一遊行，香港政治、社會都有新的變化，香港社會主流意識出現了以當今所謂的“左”作為謾罵對象的潮流。我們認為，現今香港主流的所謂“左”與全球公認的左翼標準，完全是兩回事。真正的左翼，是沿於法國大革命中堅持自由平等原則的進步派，左翼的社會主義源自歐洲啟蒙運動。在世界上，左翼社會主義有著代表社會平等、公正的、人的解放的意義。儘管蘇東劇變已過了十多年，但是現今資本主義體制，貧富懸殊達到最高峰，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全球局勢動盪等危機接連不斷，我們有理由相信，社會主義左翼是代表著資本主義以外的選擇，而且並不是所謂的烏托邦。一個更公義、平等、合理的世界是可能的。

對香港新自由主義的反思

作者：阮峰

香港的新自由/新古典主義者對香港經濟不振的唯一解釋就是政府干預、市場不夠自由。縱使他們那位可敬的美國友人--弗利民稱讚香港為「世界自由經濟的典範」，美國新自由主義雜誌在二零零三年更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城市」，排名更在新加坡之上。但對於我們的新自由主義大師們來說，香港的市場不但不夠自由，甚至可說是“社會主義”。這究竟是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崇尚“社會主義”，還是兩地新自由主義者對「自由」的理解並不相同。現在讓我們探討一下香港新自由主義者對政府干預市場的指控吧。

“八萬五”鬧劇

香港新自由主義大師們對政府干預市場的最常見指控就是「八萬五」。「八萬五」政策沿於九六、九七年時地產炒風熾熱，普羅市民或買不起住所，或是承受著高昂租金的沉重負擔，使得「有屋冇人住，冇人冇屋住」。當時的輿論，包括作為新自由主義者喉舌的報章、雜誌亦以此為據，攻擊政府壓抑炒風不力、殘民以肥地產商。直至政府推出興建八萬五千個住宅單位的計劃推出，即時的反應就是地產商和炒家的抨擊，他們都模仿起新自由主義的大師來，指政府干預市場。有趣的是，這在當時的新自由主義者中並未引起激烈反應。在「八萬五」政策推出的時候，亞洲金融風暴亦同時爆發。根據當時來自地產商與新自由主義者的調查及報告，他們大都把樓市下滑的原因歸咎於金融風暴的衝擊，而非“八萬五”政策。但究竟從何時開始，矛頭又指向了政府呢？

政府受到來自大地產商的壓力，在二零零零年起停售居屋，並把居屋改為出租公屋。這個大動作再次引起新自由主義者的注意，他們一方面稱讚政府停售居屋的決定，另一方面又為刺激經濟提供藥方--徹底取消「八萬五」政策。當時的新自由主義者相信，只要政府徹底取消「八萬五」政策，便能使樓市“擺脫「八萬五」的陰影”。但往後的發展，相信各位都記得一清二楚。新自由主義者“求仁得仁”，董特首順應了他們的民意，宣佈「八萬五」已“不存在”了。但事情的發展，卻沒有實現新自由主義先知們的預言，經濟環境並未因此而得到太大改善，相反，不斷受減薪剝削的勞工階層還得負擔樓市反彈後的高昂租金。

「八萬五」如新自由主義者所希望般“不存在”了，同時，他們的預言亦受到考驗。這時候，我們偉大的新自由主義大師們又想出了另一個主意，他們不單不能讓“「八萬五」的陰影”消失，還要讓「八萬五」成為香港人心目中揮之不去的惡魔。

公營機構與私營化

挾著「八萬五」的“餘威”，可敬的新自由主義者們又對香港經濟提出了新藥方--私營化和外判化。他們以「八萬五」為據，力陳政府干預的禍害，認為只有把公營機構私營化和外判化才能救香港。新自由主義者所持的理據是，公營機構缺乏效率而薪金過高，這兩者都是妨礙市場發展的“罪惡”。但事實上，政府早在九七年已開始私營化的計劃，首當其衝的就是房屋署，並不斷把外判的項目增加。在私營化的壓力下，大量原受僱於公營機構的員工失業，即使是僥倖保住工作的，亦要面對薪金大幅減少及工作量的增加。承包公司為了追求最高利潤，把工人的工作量增加到可怕的程度，而這亦直接導致服務質素的下降。

但新自由主義的大師們最少有一點是批評正確的。公營機構員工的薪金的確過高，但僅限於中、高級管理人員而言。而且，不但是公營機構，私營機構的管理人員的薪金同樣高得不合理。根據二零零三年的一個調查顯示，香港的 GNP 雖與英國相近，但香港管理階層的薪金卻是英國同行的三倍，相反，香港基層工人的薪金卻只有英國同業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政府早已把新入職公務員的薪金調低至貼近私營機構的水平。可是，新自由主義者所批判的高薪者當然不是指香港的管理階層，因為他們本身就是這個階層的代表。

新自由主義與現實

雖然特區政府早已如新自由主義者們所希望般推行了一系列私營化和外判化的改革，而這亦帶給已處於水深火熱的普羅大眾一個更沉重打擊。但自以為手握真理的新自由主義騎士們仍然不斷譴責政府要攪“社會主義”，厚顏無恥地把一切私營化和外判化帶來的災難描述成干預市場的「罪惡」。但這同時卻又打了稱讚香港為「全球最自由城市」的弗利民一記耳光，把弗利民把成“社會主義者”了。

香港的新自由主義者常對美國的經濟成就推崇備至，但美國卻遠非他們所想像的新自由主義天堂。美國與很多歐洲國家一樣，有工時和工資限制、有強大的工會和限制貿易的政策。因此，無怪乎弗利民對香港會如此嚮往。

縱使新自由主義在香港不斷為普羅大眾帶來災難，但藉著對傳媒機器的壟斷，正直的新自由主義者們仍然得以自圓其說，把一切罪責都扣到不存在的“社會主義”幽靈的帽子上。新自由主義則繼續立於永遠正確的不敗地位。

在本文的完成期間，香港再次榮獲“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的“殊榮”。但對此最感高興的卻不是可敬的新自由主義者們，而是長期被新自由主義者責以“干預市場”罪名的特區政府。對於這個原該藉得振奮的消息，新自由主義者們表現得十分冷淡和沉默，看來他們對這個外國同志送來的“賀禮”並不怎麼欣賞...

二零零四年八月

9·12 後看資本主義選舉制和議會制的缺陷

作者：紅仁

自從七一事件後，香港人和香港的政治氣候出現翻天的變化：除了頻頻的、大大小小的示威和集會遊行外，例如今年六四燭光集會人數破了八萬人，為近年之冠，其他如去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可看出市民反應之踴躍，似乎有耳目一新的景象。

上月的 9·12 選舉，投票率達 55%，多多少少可反映市民對政治的要求提高和對政府的不滿。但在選舉前，卻有一些負面消息，包括民主黨涉嫌在內地嫖妓、以及陳婉嫻、梁富華租用辦事處租金問題有欺詐之嫌，儘管可能有敵對政黨故意攻擊對手，但也不能排除有議員有以權謀私之嫌。事實上，這也不是一個奇怪的現象，議會花天酒地，以權謀私已不是新鮮的事了。而且，那些「為民請命」的議員都擁有多個物業和公司股份，簡直就是資本家，很難想像得到他們會拋開一切以往名利，老實地為市民謀利益。既然如此，那些大小資本家又為什麼肯降低尊貴身份，「捨命」為市民服務？

資本主義選舉制的缺陷

選舉制本是讓各階層的人能夠選出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為人們服務，如今已變質為參選人攫取利益的金礦，就以這個標榜民主和自由的美國為例，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允許任何人向候選人提供資金的，而候選人有權保密關於獻金的資料，包括捐款人和金額。這種制度有其壞處，容易導致捐款者向候選人以捐獻名義貪污，而這種捐獻若未經傳媒揭發，是從來不會公開的。

美國的選舉制度是十分混亂和登記制度的複雜，美國的州官員可以任由自己決定選區界限，官員劃分選區像小童玩泥膠一般幼稚，州官員可以隨便劃出奇形怪狀的選區，如環形、夾心形等，這樣很容易導致州官員可以按自己政黨或政治立場而決定選區界限，造成選舉不公平的現象。很多時候選舉結果已在意料之內，其結果是 80% 議員以絕對優勢勝出，眾議員 435 席位中只 30 個是以激烈競爭產生的。其次是登記制度的繁複，使很多選民卻步。使到美國人的投票率越來越低。

資本主義議會制的缺陷

資本主義議會制度已存在好幾個世紀了，雖然議會制度在過去曾有過其可取和進步之處，但是在選舉制內很多參選限制（例如高昂的選舉費用）以及議員的優厚的薪金和特權下，議會制和議員已不能代表人民了，那些民意代表很多都是商界、律師和專業人士出身，很少是低下層出身的。對市民來說，

很難想像他們會紆尊降貴和市民不起平坐，選舉承諾在當選後成為空話，當選後，身份提高了，便利用各種特權，巧立名目地攫取利益：

- 1 以考察為名，實則遊山玩水的公費旅遊。
- 2 把公費的剩餘部份中飽私囊。
- 3 把親屬的名字列在發薪名單，實則把工資放在自己的腰包裏。
- 4 以個人名義使用自己或親屬單位作辦事處，但卻虛報另一處會址，籍此騙取津貼。

議會制內的議員在一個任期內（通常為四年）有很多機會發展其私人利益，而且，議員也享有高薪金和種種特權。再加上「人民代表」很多是資本家或專業人士出身，在生活上和利益上都和人民背道而馳，議員享受舒適的生活，又怎會紆尊降貴去和人民平起平坐？整個議會簡直就是資本家專政。

“左派的民主普選和議會”——巴黎公社的選舉和議會制

1871年，巴黎的工人們拿起武器，推翻了梯也爾的資產階級政府，建立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政權——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在歷史上只存在兩個多月，但它的存在實在為無產階級帶來欣喜，它的存在證明了無產階級對政治有更進一步的要求，及有能力成為主人翁。其中最大的成就要是公社特有的選舉制和議會制了。

巴黎公社成立後，沒收僧侶和教會的財產，並改由民眾組成的國民自衛軍代替已被解散的常備軍和警察。公社又把舊有的官僚機構取消，設立公社委員會，公社委員會由十個委員會組成，包括：執行、軍事、司法、治安、勞動和交換、糧食、對外聯絡、社會服務和教育，公社委員會和以往議會不同之處，是公社在民眾的監督下，把立法和行政合一，使行政效率提高，改變舊議會的散漫作風。

而公社的委員會的所有成員都是全部通過選舉產生的，當時《公社報》第三號說：“選舉制應該適用於一切社會職務，這個原則是民主的靈魂。”而經過選舉出來的委員與其他人民一樣，只領取普通工人的工資，取消以往官吏和國會議員的特權，而委員們也可以隨時被民眾撤換，其行政權也納入民眾的監管範圍。防止委員變成騎在人民頭上的官僚。

在今天，那些經常為資本主義欣喜的人為「資本主義繁榮」和「民主典範」而歡乎雀躍的時候，資本主義的議會制和選舉制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了，議員不斷地打跨對手、官員帶着偽善面孔擺出「親民」形象，在「正義友善」的面孔的背後，大攬私有化，把全民擁有的公共企業據為己有，又報假開銷欺騙人民的財產，把整個社會一切常成自己的金庫，但人民卻只能看又無力阻止，這樣的社會能說是一個民主法治的政府嗎？值得深思。

私有化遺禍甚深 推動民主化才是出路

民間反對公共資產私有化

聯合聲明

近日，社會對「領匯上市」討論眾說紛紜，有論者要抽出「幕後黑手」，認為原訴人「阻住人發達」，並扣上「危害香港金融市場地位」的大帽子。然而，對於關鍵問題——公營部門私有化，社會幾乎毫無提及。

我們認為，政府近年推動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管治原則，決意將房委會資產、機場、五隧一橋等資產私有化，這些措施實際上是化公為私，劫貧濟富。這樣下去，必然會加劇壟斷，貧富懸殊問題將繼續惡化，嚴重危害香港發展的長遠利益。

公屋商場一直是房委會主要收入來源之一，每年為房委會帶來可觀盈利。一旦將商場私有化，無異於殺雞取卵，不單無助解決房委會的財政危機，相反會令房委會損失一筆可觀、穩定的收入，令房委會的財政狀況埋下更深、更長久的危機，嚴重危害基層市民的居住權利。因此，我們認為，政府必須立刻停止變賣房委會的公共資產；放棄其縱容大地產商壟斷及操控房屋供應，剝奪小市民住屋權利的政策；並且與社會討論改善房委會財政狀況的措施，令公營房屋得以繼續發揮滿足基層市民住屋需要的重要角色。

世界各國經驗早已證明，私有化與改善服務質素並無必然關係，將公營部門交由以利潤為先的財團控制，反而會嚴重危害機構員工以及服務使用者之權利。私有化的計劃，最終受益的還是財團，勞工基層將是輸家。我們只需要看看由私人財團經營的房屋、電力、交通等重要的公共服務，多年來在廣大市民身上搜刮了多少民膏，令多少市民辛苦賺來的血汗錢流進肚滿腸肥的大財團口袋中，大家便會明白官商口中唸唸有詞的私營化的好處，根本完全是糖衣毒藥。

我們認為，要改善公營機構或部門的官僚作風及效率低下的弊病，可以透過推動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進行民主化，令市民有更多監管及參與意見的機會。私營化不單無助於改善公共服務的質素，反而會因為財團唯利是圖的本質，令市民更難於監管和制衡，最終只會肥了財團苦了市民。香港公共資產，是包括基層和中產在內全港市民的寶貴財富，對於政府公然化公為私，民間團體不能再沉默。

因此，我們強烈要求：

- 1) 房委會停止公屋商場、停車場的私有化計劃，並重新諮詢公眾；

2) 政府推動任何影響現有公營部門服務的重大政策和計劃前，必須先充份諮詢公眾，並先取得立法會的批准；

3) 政府盡快進行政治體制，包括各級議會、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民主化，以改善施政水平。

發起團體：

全球聯陣——勞工基層大聯盟

聯署團體及市民：

全球化監察、先驅社、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基層大學、香港基督徒學會、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理工大學學生會、中文大學學生會、中文大學基層關注組

理工大學基層關注組、西貢區青年聯社、中大團契、紫藤、群福婦女權益會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勞資關係協進會、香港職工會聯盟、街坊工友服務處

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清潔服務業職工會、香港郵政局員工會

港九拯溺員工會、政府僱員團結工會、食物環境衛生署管工職系工會

政府第一標準薪級員工總會、醫院管理局職工總會、前線福利從業員工會

香港醫院合約及臨時員工總會、環境衛生康樂文化人員協會

管業及保安從業員工會、清潔工人職工會、黃竹坑關心重建小組

深水埗社區協會、房屋政策評議會

文思慧、陳家健、楊健濱、劉卓奇、鄭凱茵、鄧寶山、蘇耀昌、戴遠雄

梁志遠、許少英、楊國雄、俞若玫、吳國偉、吳詠雪、孔令瑜、楊文友

李峻嶸、朱江瑋、譚亮英、吳慧玲、麥德正、蔡建誠、李玉蘭、嚴月蓮

林依玲、嚴月娥、楊穎仁、盧居樂、潘建肇、楊曉輝、陳偉成、徐永興

邢定浩、吳鴻達、馮廷峰、區龍宇、林致良、鍾婉儀、吳家立、梁漢柱

張兆和、王岸然、胡美蓮、翁文鏗、丘梓蕙、黃和平、梁淑美、黃漢邦

覃俊基、雷永錫、梁靜友、江繼祖、胡浩堂、蔡雪華、林子斌、尤晴蓉

古美蓮、胡穗珊、鍾孝平、黃潤達、李俊偉、梁靜珊、江貴生、陳昱宏

黃月媚、洪玲玲、黃碩紅、戴毅龍、吳曉真、楊永誼、李世君、陳淑美

范立軒、胡露茜、楊建倫、羅櫻子、莊子慧、謝惠瓊、王曉霞、陳翠儀

陳江秀、崔鈺華、葉長秀、陳巧珍、陳昭偉、蒙兆達、潘文瀚、鍾慧欣

李劍曼、湯淑芬、陳三才、吳冠君、王宇來、譚駿賢、馮繼遠、曾智仁

章襄義、宋治德、勞泳姬、李凱、葉沛瑜、翁誠光、林寶鎮、郭錦林

葉滿光、黃華興、歐陽達初、Ma Kam Ling、Amy Yeung、Clement Lee

2004年12月31日

【投稿】

梁國雄是一位“左傾機會主義者”和“假托派”

作者：Buyo

(讀者投稿，只代表作者意見，並不表示本刊立場)

梁國雄是一位“左傾機會主義者”和“托派修正主義者” [1]。

早前本人曾在舊版的長毛競選留言版處問他關於“托派的不斷革命論是反建制的，但爲什麼他還要參加競選？”之後有一位不知名的網友列出了一網梁國雄在“一次公開節目的環節”上大談他爲什麼要參選入建制，他說要進去建制裏像孫悟空一樣“縮細”走進人家的肚子裏搗亂。

奇怪的是，他爲什麼還從來也沒有在這個網頁上談論“托洛斯基主義”的東西呢？“托洛斯基主義”主張不斷革命論和世界共產主義革命，馬克事和恩格斯當年的“共產黨宣言”也有很明確的長遠主張：“共產黨人對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最基本四點)(1)共產黨人到處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活動。(2)聯合這些力量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鬥爭時，共產黨人不放棄自己的原則立場和長遠目標。(3)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協調。(4)共產黨人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最後宣言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In short, the Communists everywhere support every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gainst the exis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 of things. In all these movements they bring to the front, as the leading question in each case, the property question, no matter what its degree of development at the time.

Finally, they labor everywhere for the union and agreement of the democratic parties of all countries.

The Communists disdain to conceal their views and aims. They openly declare that their ends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the 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Let the ruling classes tremble at a Communist revolution. The proletarian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

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Working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到現時爲止，所有歐美地區的“托派組織”也緊持這個觀點，但本人看不見梁國雄有向選民說清楚這一系列的政治主張？這樣梁國雄是否有“欺騙選民的成份”？

現在梁國雄還列出一系列的最低工資綱領，回復集體談判權的主張，但是在他不是要反建制嗎？爲什麼還要搞“最低工資和集體談判權”等等一系列的“改良主義政策” [2]？

《談起“左”這個字》

談起“左”這個字，梁國雄的意識迷迷糊糊，經常聽到有不少市民說“支持長毛對付左派”，但是長毛梁國雄也一直沒有爲“左”這個名稱正名，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左”了，而且還很“右”，真正的“左”派是反建制的，要求社會的變革和進步的，現在“梁國雄”也有“反建制的，要求社會的變革和進步的”這個（理論上、言語上、吹水上）“梁國雄”可以稱爲“左派”，但是！但是！ 這個只不過是“理論上“梁國雄”可以稱爲“左派”，在實際行動上他像個“機會主義者”和“托派修正主義者”。

爲什麼說他是機會主義者呢？他曾經是“毛派”之餘也曾經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的成員，但是據本人的調查所知“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的成員不少也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看看“岑建勳”爲例『革馬盟』屬下『十月評論社』負責人岑建勳，看現在向中國大陸的轉變已經可以看出“岑建勳”是個如何“牆頭草”的人，還有一個叫“Antonio Lou 盧思豪”的澳門人，梁國雄當然與“Antonio Lou 盧思豪認識”，盧思豪還親口述說“長毛”是師兄弟的關係，若然如此，那就看看這位“Antonio Lou 盧思豪”搞過什麼呢！

七十年代初，香港政治風起雲湧之際，盧思豪認識了《吳仲賢、岑建勳、李華明等》『托派』人士，並加入了『托派』組織『《革馬盟》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在吳仲賢領導下工作，是『革馬盟』屬下『戰訊』的骨幹，並與『革馬盟』屬下『十月評論社』負責人岑建勳成爲親密戰友。

大事件發生 2000 年《澳門爆發裝修工人反失業示威》

這次澳門警方再次施放催淚彈出動水炮車驅散示威者，有八名示威者被捕，警方合共施放了八枚催淚彈。自此盧思豪馬上離開了澳門，前往西南歐等地過着半工作半流浪式生活。這次事件是“反對澳門政府大量輸入外勞”，但爲什麼作爲一位“托派”的社會主義者不去向別人談談“國際主義”聯合“各地工人階級”的主張呢？爲什麼要支持“不同地區的工人敵對？”這是“托派”的社會主義者嗎？這一系列的行爲証明了“革馬盟”跑出來的人大多也是機會主義者。

還有一個梁國雄非常尊重的劉山青，他不是自稱爲“馬列主義”嗎？爲什麼還會混去搞“復歸孫文”？孫文主張的是“社會主義”嗎？劉山青坐了十年監就值得梁國雄尊重嗎？那請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烈士是否值得“梁

國雄尊重”呢？這真是不知道，但梁國雄不會不知道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是指什麼意思吧？四五行動燒國旗，就是對人民共和國的革命烈士不尊重，反正梁國雄是一位機會主義者，他從前是的毛澤東派，從前是托洛斯基派，現在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派，“變來變去”，一有機會就馬上再變，梁國雄真是一身“機會主義者”的味道！

網友和選民們！請用你們的“深入眼光”去分析一下“長毛”的心路歷程，就會發現到他這種“機會主義者的風格”。

註釋

[1]“托派修正主義者”：所謂“修正主義”就是指那些假裝高舉著“馬克思主義”的人士，他們口頭上和外表上聲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其在實際行動中說的另一套，做的也是另一套。

[2]“改良主義政策”：正就是“梁國雄”沒有為他“馬克思主義政治主張正名”，所以本人把他的“爭取最低工資”評為改良主義。若然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已經清楚向人民交待了自己是為“是要組織工人，讓工人看清制度的問題，而去爭取最低工資揭露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話，那本人就不會對他的“爭取最低工資”評為改良主義。

出 版：赤新編輯部

赤新編輯部成員：鐵托 阮峰 亞輝 亞浩

聯 絡 員：鐵托

排 版 員：hkleftist

出 版 日 期：2005-1-31

投 稿 聯 絡：cx@hkcommunist.org